

習主席宣示改革開放 大橋開通具特殊意義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習主席視察廣東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意志和決心。習主席親臨主禮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也是今次視察廣東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亮點，表明中央期望粵港澳大灣區在新時代推動形成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如何發揮港珠澳大橋效益，推進大灣區建設，是擺在粵港澳面前的共同任務。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習主席十八大主政之後，首次赴地方考察就選擇了廣東。他當時表示，之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到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向前推進。

大灣區擔任國家開放重大角色

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主席南下廣東考察調研。他說，「再一次來到深圳，再一次來到廣東，我們就是要在這裡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開放永不停步！下一個40年的中國，定當有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就！」
當前，全球經濟正面臨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無端挑起的貿易戰、關稅戰的陰影。中國更是面對美國一意孤行試圖以貿易戰遏制中國崛起的挑戰。習主席視察廣東的講話，表明中國將牢牢把握改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延續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而新一輪改革開放將更強調自主創新、以民為本。習主席視察廣東的講話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意志和決心。
習主席去年「七一」視察香港時曾深情地說：「香港同胞一直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從未忘記。」中央決定建設大灣區的根本目的是要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進一步提升

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支撐和引領作用。習主席親臨主禮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也是今次視察廣東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亮點，表明中央期望粵港澳大灣區在新時代推動形成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

發揮大橋效益推進大灣區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首次全體會議，全面深刻闡述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根本目的、戰略意圖、目標願景、原則要求和方向路徑，從決策層面標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全面深入推進實施的新階段。港珠澳大橋開通，則是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標誌性項目，是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關鍵性建築，從基礎設施層面標註大灣區建設進入全面推進的新階段。如何發揮港珠澳大橋效益，推進大灣區建設，是擺在粵港澳面前的共同任務。
概括而言，港珠澳大橋具有經濟、旅遊、民生三方面的重大效益。經濟效益方面：一是帶動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互聯互通；二是有利香港資金前往粵西地區投資、設廠，把港澳與珠海、中山、佛山、肇慶、江門等城市及周邊地區聯通起來，促進粵西地區發展，有效平衡灣區東西差距；三是提速灣區經濟與粵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一流灣區看齊。大橋總設計師孟凡超便預估，大橋間接產生的GDP量將以萬億元人民幣計。

旅遊效益方面，大橋是中國由橋樑大國成為橋樑強國的標誌，創下多項世界建設之最，被英國《衛報》選為「新世界七大奇跡」之一。大橋總長約55公里，是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晚上發出的亮光成為大灣區一顆耀目的明珠。這些工程特點可以轉化為新旅遊優勢：一是大橋成為中國橋樑「走向世界」的靚麗名片，吸引海內外遊客一睹奇觀；二是內地訪港旅客將更便利，特別是對粵西地區的旅遊業帶來刺激作用；三是有助推進大灣區內港珠澳「一程多站」旅遊發展，創設嶺南文化體驗新路線。

民生效益方面，大橋大大縮短了港珠澳的時空距離，可將香港到珠海的交通時間由目前水路1小時以上、陸路3小時以上，縮短至30分鐘以內，令三地「一小時生活圈」全面貫通。大橋徹底改變大灣區、珠三角的交通出行模式，促使人們升級全新的生活方式，享受到大橋基礎設施所帶來的便利。

把握新一輪改革開放機遇投身大灣區建設

我們需要從國家改革開放大局和大灣區建設層面來看待港珠澳大橋的重要意義。香港是國家40年改革開放的促進者、參與者和得益者，更要把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大利好，以港珠澳大橋開通作為新的起點，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融入國家改革開放的大局，貢獻國家，發展香港，造福港人。

填海造地 投資未來

張俊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青年事務委員會顧問「就是政言」主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佈了上任後第二份施政報告。筆者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其中一個最大的亮點在於「明日大嶼」計劃。林太提出了1,700公頃的填海造地計劃，為投資香港未來，踏出了重要的一步。由於計劃涉及多個層面，亦需要龐大的資源，引來社會不同界別人士的批評，此舉亦正好反映了林太「迎难而上」的施政方針。筆者認為，落實好「明日大嶼」計劃，正正是為香港再次騰飛打好基礎。

在施政報告進行諮詢期間，筆者已經發表了文章，支持香港要進行填海，並且必須大規模填海，甚至要再填一個香港。事實上，現時香港人的居住實用面積只有170平方呎，與上海、深圳、新加坡等城市相比，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僅及別人的一半，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很小的。新加坡有22%土地是填海得來，並且將在2030年底前再填多8%的土地。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積達270平方呎，比香港多近59%。填海造地已是全球主要濱海城市重要的土地來源，但在香港，近年填海工程卻幾近停頓，當中有是方方面面的原因，既有環保，亦有人為的因素。但是，回頭來看，填海造地，肯定是正確的方向。

「明日大嶼」提出來後，有些人的即時反應是指計劃等同「倒錢落海」、「耗用萬億公帑」，以圖令民卻步。亦有人陰謀地指「明日大嶼」只是虛晃一槍，林太的目標還是在新界的農地及棕地。當然，亦有環保人士及工程界人士，從技術上提出他們的擔憂。筆者並非政府官員，無意代替官員回應這些問題，事實

上，不同的問責官員，在這段日子已向公眾進行解釋工作。筆者只是想表達兩個觀點，首先，造地建屋需長時間，不會出現只填海不收地的情況。眾所周知，香港今日今日的政治環境，從提出填海計劃，到真正能建屋住人，可能要用十年來做計算單位，因此，發展新界農地，甚至開發一些生態價值不高的郊野公園邊陲地、棕地、荒地，等等，都應該視之為中期的建屋用地，當然，在提出「明日大嶼」計劃的背景之下，政府能夠收回土地發展房屋，相信會較目前容易。

另外，「明日大嶼」是一個比較長遠的規劃，體現了本屆政府對於香港的長遠承擔。如果單單從取悅市民的角度來看，林太提出中、短期「派糖」措施，肯定会獲得更多即時的「掌聲」，但是，林太選擇了這個相對敏感的項目，甚至可以用說，就算林太能連任一屆行政長官，到她完成整整兩屆任期，都未能見到計劃的成果，這種純粹從香港未來發展的角度，提出具長遠規劃的膽識，正正是目前香港真正需要的領導人。

林太在這段日子，不斷向社會解說計劃的重要性，筆者最欣賞的，是林太說如果不做這個計劃，會「愧對香港的下一代」。我們可以暫時不考慮整個投資計劃帶動的經濟效益，單單以真正能夠使用填海得來的土地，即已經是30，或者50年以後的事，我們目前的投資，為今日的青年人，甚至是還未出生的香港人，留下可以大規模發展的土地，讓未來一代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國家及香港的實際情況，進行適切的規劃。今日這一步，正是為香港未來的整體發展，留下了空間，亦是打下了發展的基礎。

依託本港專業優勢 積極推動「一帶一路」

盧偉國 博士 「一帶一路」總商會大型基建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本港很多工商專業界人士都非常關心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會為香港帶來什麼新機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公佈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亦強調特區政府會致力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並且已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我認為是值得大家重視。

首先，在去年年底，香港特區政府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了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通過26項合作措施，奠定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關鍵地位，涵蓋了香港擁有獨特優勢和地位的六大重點領域，分別是金融與投資、基礎設施與航運服務、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相通、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加強對接合作與爭議解決服務。今年6月，「一帶一路」聯席會議首次在北京舉行，為香港與內地相關部委就「一帶一路」倡議建立獨有和直接的高層次溝通機制。同時，本港的政府架構和人員配置等方面也有配套安排，例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在政府推動「一帶一路」工作上擔當牽頭和協調統籌的角色，並且正在招聘「一帶一路」專員專責相關工作。由商經局管理的「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也會繼續提供資助，加強對外宣傳，以及協助專業服務界把握「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遇及應對挑戰。此外，政府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自2016年起連續合辦了三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為內地、海外與香港企業提供重要的「一帶一路」商務投資平台。

當然，正如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我們應致力確立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首選平台和重要節點，加強政策聯通，用好香港專業服務中心的地位，推動與內地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及地區建立夥伴合作。

我認為，香港應爭取繼續發揮在國際交通樞紐、科研實力、市場經驗、檢測認證、工程基建及法律仲裁等專業領域的特有優勢。因此，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第一個提案，集中探討如何促使香港與內地合作建立國際爭議解決機制，發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國際仲裁中心。

跨境工程基建項目也應該是另一個合作重點。日前，本人非常榮幸見證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大橋在設計和建造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開創了「三地兩制」協同創新的合作模式。大橋連通珠三角東、西兩岸，加上高鐵香港段開通連接全國，粵港澳三地未來應着重優化跨境基建聯通，促進區內機場、港口、鐵路、大橋等的整合利用，並在跨境通關、稅收、人員和資金流通等方面拆牆鬆綁，加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路」區域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達至橋通、路通、財通和人心通。

美國股災或引發新一輪經濟危機

張敬偉

上周，標普500指數累跌約4%，道指累跌2.97%，納指累跌3.78%，其中標普500指數數內漲幅已經歸零。美國股災或引發新一輪經濟危機。

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救市帶來的充裕流動性漸漸枯竭，缺少流動性澆灌的股市盈利預期也後勁不足，美國急速增長的債務在刺激股市增長之後會給新一輪經濟周期埋下禍根。眾所周知，過去十年是美聯儲拆放水——多輪量化寬鬆（QE）唱主角的時代。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由此迅速膨脹，從危機初期的1萬億美元到危機後期2014年迅速升到4萬億美元。這些流動性經過華爾街的操作湧向股市的資本總額高達30萬億美元。

另一方面，美聯儲洞悉其中的風險，因此從2015年開始停止QE。但是美聯儲無法也不對QE政策急剎車。如果完全停止QE，急速推進貨幣政策正常化，美國股市會因為釜底抽薪而陷入紊亂，美國經濟基本面也會受到影響。美聯儲加息的漣漪效應也會形成負面傳導，讓美國——主要是美聯儲的努力付之東流。中國股市動盪、英國脫歐公投成為當時影響美聯儲加息政策的外部因素，這也形成了耶倫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鮑威爾時代的謹慎加息政策主調。

美國經濟復甦在2015年終止QE時已經曙光初現，但由於QE帶來的大水漫灌對美股的影響力太大，美聯儲為了讓美國經濟增長和股市表現同步，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伐一直很慢，美聯儲內部也爭吵不斷。直到特朗普時期，鮑威爾才逐漸加快加息縮表步伐。

美元地位下降

當然，特朗普政府也對美國股市有貢獻，其大規模減稅政策和「美國優先」，不僅釋放了國內超過萬億美元的資金，也吸引了海外市場萬億美元的流動性注入。特朗普對這些流動性的預期是好的，希望流向實體經濟，重振美國製造業。但結果並不樂觀，還是進入美股，彌補了美聯儲加息縮表帶來的流動性缺失。這極具諷刺意味。特朗普的減稅計劃是為了做大做強實體經濟的目標，實際上卻為金融資本提供了後援，由此帶來的「特朗普行情」又成為特朗普炫耀政績的資本。在中期選舉的政治訴求面前，特朗普又寄望於股市提振民意，因此特朗普將美股大跌歸咎於美聯儲。然而，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目標，就是為了讓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將股市流動性引流至產業領域為實體經濟服務。

特朗普和美聯儲不在一個軌道上，前者是政治掛帥，後者是問題導向。兩者難以相向而行，美國市場也就出了大問題。更重要的是，美股下跌不僅是上個周期美聯儲大水漫灌「斷流」的結果，也消耗掉了特朗普大規模減稅刺激美股的剩餘價值。而且，奧巴馬時代的美聯儲QE救經濟，全球篤信美國和美元信用，美國可以讓全球分擔美國經濟風險。現在特朗普執念於「美國優先」，美國公信力和美元信用大幅流失。從歐盟到中國，正在嘗試擺脫全球貿易中的美元支付體系。在此情勢下，美元不再是稀釋美國債務的靈藥，更非轉嫁危機的利器。現實很殘酷，美國私人儲蓄率維持不足7%的歷史低位，然而美國私人債務佔比GDP高達202.8%（2017年底），迫近2008年次貸危機高峰期的213.5%。此外，企業債和美國公債規模也在膨脹，截至2018年8月份，美國企業貸款總量是22,173.7億美元；截至2018年9月，美國聯邦公債與GDP的比率是105.4%，公債總額是21.5萬億美元。美元地位下降，美股震盪下調，美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在加大。關鍵是，美國基於「特朗普行情」和經濟向好的樂觀，採取和全球摩擦的「美國優先」政策，從而給全球市場帶來了一股肅殺之氣。

若美股繼續下跌，全球市場信心將會崩盤，美國成為新危機的策源地將是大概率事件，帶來的殺傷力料遠超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



流動性收緊引發美股下跌，隨時引發新一輪經濟危機。

黃之鋒已成美國用完即棄的政治廢物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簡稱CECC）周五在twitter表示，將計劃提名「疆獨」分子伊力哈木角逐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這個CECC的主席不是別人，就是臭名遠播的美國共和黨鷹派參議員魯比奧，而這個魯比奧在今年2月，就聯同一班美國政客提名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競逐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們在「雨傘運動」中的貢獻云云。

才不過8個月的時間，魯比奧已經對黃之鋒等人失去了興趣，「移情別戀」到其他「獨派」人士，魯比奧的行為說明了兩個事實：一是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淪為外國政客干預預國內政的工具，和平獎變成「分裂獎」，已經背離了原來的意義。二是黃之鋒等人隨著政治力量和聲勢江河日下，黃之鋒甚至要「紆尊降貴」參選其厄苑的座代表選舉，結果都大敗而回。昔日「小先鋒」今日成「廢將」，外國勢力亦對黃之鋒失去興趣，視如棄卒，從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到變成外國勢力用完即棄的政治垃圾，這正是甘當外國勢力棋子的下場。

根據諾貝爾基金規定，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並不高，一個國家的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在任國家元首；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及常設仲裁法院成員、相關學科的大學教授和研究所總監、歷屆和平獎得主等，都有資格提名。就是因為提名門檻如此低，而有關提名人選又可以吸引到國際媒體的關注，所以諾貝爾和平獎逐漸成為外國政客挑動政治風波、干預他國內政、為他們的政績打氣吹捧的工具。

在上一屆，同一班美國政客提名黃之鋒三人，以「表彰」他們在「佔中」時的貢獻。

但奇怪的是，「佔中」發起人不是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佔中三丑」嗎？要「表彰」為什麼不是他們三人，反而吹捧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這些國會議員的「貪新忘舊」，正是因為黃之鋒周永康代表的「雙學」在「佔中」期間成功「奪去」了行動大權，再加上當時聲勢正盛，而他們又正面對法庭審判，魯比奧等人提名三人，既是為他們打氣，也有向香港法庭施壓的意味。

然而，如果魯比奧等人真的如此佩服黃之鋒等人，上次提名失敗，今次理應再接再厲，怎麼突然又換上另一位「疆獨」分子，將黃之鋒他們棄之如敝屣？當中既是為了配合外國勢力近期不斷借新疆說事，也是因為黃之鋒等人已經失去了政治價值。黃之鋒立法會之路斷絕，區議會之路也斷絕，甚至連代表也失敗，他一手創立的「香港眾志」已成雞肋，骨幹為了參選紛紛改換門庭，「香港眾志」樹倒猢猻散，「港獨」派潰不成軍，外國勢力花了這麼多精力、時間、投資培養的「顏色革命」種子一鋪青袋，投資嚴重虧損自然要急急抽身。而諾貝爾和平獎這個政治工具，也寧願留給新的、更有用的棋子。曾經在香港政壇不可一世的黃之鋒，成為了用完即棄的政治垃圾，這也是他咎由自取。

至於諾貝爾和平獎，從來都是政治掛帥，頒給誰不頒給誰，到最後還是政治考慮，與和平其實半毛錢關係都沒有。諾貝爾和平獎前秘書長倫德斯塔德早年在回憶錄表示，後悔頒給奧巴馬。當然他自己也是其身不正，令和平獎變成鼓吹「分裂獎」，成為全球笑話，他身為秘書長難道沒有責任？用和平獎粗糲干預他國內政，公然支持分裂勢力，就會帶來和平？這些人道主義的沒有半點羞恥之心？